

周策縱老師的專注精神

鍾 玲*

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二年間我在威斯康辛大學讀碩士、博士學位。周策縱老師在威斯康辛大學東亞研究系所開研究所的課，我共選過三門，包括中國文學批評史及類書等。我是比較文學系學生，但有不少學分可以選其他領域的課，所以才有幸忝列周老師的門牆。記得上課時候，周老師講課講得興起，超時不下課是常發生的事。在文學批評史的課上有一次他講解《詩經》〈大序〉中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」一句，由文字學角度剖析「詩」、「志」、「之」三個字，一句共講解了三小時四十分鐘，也就是說遲了四十分鐘才下課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這件事不只顯示了周老師窮追源頭的做學問工夫，更重要的是表現了他的專注精神。當他講《詩經》〈大序〉中這一句，他就專注在研究每一個字上、研究全句的內涵上；當他講課授業，他就專注在講課授業上，其餘都變成次要了。專注是做大學問的必要條件。

最近讀到收在陳致博士編的《周策縱舊詩存》（香港：匯智出版社，2006年）一書中周老師的文章〈初中點滴：初離家鄉和捲入反日運動——《棄園自傳》之一〉，才有機會認識到少年時代的周老師。原來他是專考第一名的，一九三一年十五歲他由鄉下到衡陽去考初中，考三間中學全都高中第一名，三年後又以第一名畢業於衡陽最好的中學。他不只在國文課上是最優秀的學生，物理課也考一百分，連在體育課上，賽跑、打球、跳高、跳遠的成績都是最好的幾個之一。周老師在文學上才華高絕，國文課上出類拔萃不足為奇，但連上物理課、體育課也出類拔萃，我想必然源於他做事時的專注精神。文章中又記載他在初中時曾任伙食團的委員，每次當採買工人去菜市場買菜時，就要有一位委員隨行負責監督，以免工人與菜販溝通作弊。周老師說他「對這些瑣碎的事，沒有耐性，覺得很麻煩」，但他很快就

* 鍾 玲，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、講座教授。

發現不能馬虎從事，否則會影響同學的權益，所以他就專注地做這件事，「看東西的素質好不好，價錢好不好，秤是不是足」。而且他發現這件小任務背後的意義不只是為同學服務，自己也能學習到實際的「日常生活的財經」，是課堂上學不到的。可見周老師如果發現一件事有意義，無論多細微瑣碎，他也會全力以赴地專注學習。

在做學問上，周老師的專注當然不只放在一個字一句話上，也放在宏大的題目上，就像是五四運動這個攸關民族命運的大題目。「五四運動」是周老師專注的兩大題目之一，另一項是《紅樓夢》。周老師出生於一九一六年，他在《五四運動史》中把五四時期的開始定在一九一七年，換句話說周老師與五四運動是一起出生、一同成長的。這個運動又徹底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。除了有時代上的切身經驗，周老師專注於五四運動的研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，在一專訪中他曾說明寫《五四運動史》一書的動機：「自從中國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觸後，中國應如何批判和繼承傳統，中國前途如何安排？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，要解決這些問題，只有對中西文化互動後中國人的反應與改變做全面檢討，方足以謀解決之道。」（劉作忠：〈浮海著禁書——周策縱和《五四運動史》〉）一九五二年周老師決定以此題材寫博士論文時，系中某教授不僅不同意這個題目，還要取消他的獎學金。此外，周老師當時寫這個題目是吃力不討好的，因為他決心不採用政治立場，而採用公允的歷史角度，發掘歷史真相，這種角度肯定會得罪兩岸政權。但是我想寫《五四運動史》是周老師書生報國的途徑，他希望能在文化與歷史的根本，尋求救國的方法。所以一經決定，他就專注去進行。此書一九六〇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英文本。中文譯本一九七〇年代在香港《明報月刊》連載，一九八一年由明報出版部出版了上半部，一九八〇年臺灣龍田出版社出版了香港譯本並補譯了下半部，一九九六年內地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譯全本。周老師對五四運動的專注綿延一生，他一直關注中國的青年運動。一九八九年四月天安門廣場上聚集成千上萬追求民主的青年，周老師還到廣場上去與學生們暢談當年的五四運動，當時他已七十四歲，這是老五四與小五四的對話。我看過周老師在廣場上與青年的合照，他的臉全神貫注，意氣風發。